
《心理学报》审稿意见与作者回应

题目：人际关系对社会责任感的影响

作者：黄四林 韩明跃 张梅

第一轮

审稿人 1 意见：社会责任感是一个有着重要现实意义的研究主题，作者研究了人际关系和共情两个因素对社会责任感的影响，得出了一些重要结果和发现。文章具有一定的创新性，论文书写规范。但也存在一些问题：

意见1：前言：人际关系有三种类型，作者解释了情感性和工具性，而对于混合性没有任何阐释。虽然作者主要操纵前两种，但也是有必要阐释一下，毕竟现实的人际关系类型中，混合性的还是占有很大比例。

回应：在文章的引言部分进行了说明，具体见文章修改蓝色字体部分。

意见 2：三个研究之间的逻辑关系还需再厘清，尤其是研究二和研究三之间，将人际关系的效用和亲密度分开在两个研究中考察是否合理，因为任何一种类型的人际关系都应该包含亲密度和效用，作者研究二中的启动材料--同班同学，必然涉及到情感性成分在里面，但作者只是将其作为效用的启动材料来使用；另外，研究三的亲密度是否可以在研究二中一并进行呢。

回应：总体上，本文三个研究的逻辑思路是：研究一是相关研究，探索人际关系与社会责任感二者之间的相关关系，研究二是操纵人际关系效用，确定二者之间的因果关系，研究三是探讨人际关系效用和亲密度对社会责任感的共同影响。后面每个研究都是在前一个研究的基础上进行的。

具体而言，研究一采用问卷调查法探索人际关系与社会责任感之间是否存在相关，虽然已有研究结果显示，同伴关系、同事关系或亲子关系对社会责任感具有正向预测作用（刘海涛等人，2011；McDonough, Ullrich-French, Anderson-Butcher, Amorose, & Riley, 2013；Schmid, 2012），但是这些研究没有考察更为一般层面的人际关系与社会责任感之间的相关，同时也没有考察人际关系对社会责任感影响的机制。

虽然我们的研究一发现人际关系与社会责任感之间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并且采用回归分析发现人际关系通过共情对社会责任感具有显著的影响，但是在本质上仍然是相关关系。基于这种考虑，研究二操纵了人际关系效用，考察人际关系对社会责任感的影响，试图获得二者之间的因果关系。

正如专家所指出的，任何一种人际关系都可能包含了效用和亲密度两种成分，所以在研究二中我们操纵人际关系效用时，控制或平衡了亲密度的影响，即三种启动材料都是同班同学，差别主要体现在情境人物之间的有用性，即效用。我们的设想是，在研究一相关研究的基础上，研究二的目的就是确定二者之间的因果关系，所以尽可能地控制了其他变量，使二者之间的关系更为凸显。因此，研究二仅仅考察人际关系的效用对社会责任感的影响。若是结果能够发现二者之间的因果关系，再同时考虑人际关系效用和亲密度对社会责任感的影响。于是，研究一发现二者之间相关关系，到研究二确定二者因果关系，再到研究三探索人际关系两个方面对社会责任感的共同影响，形成层层递进，逐步深入的研究逻辑。

正如专家所指出的，从现在来看，研究三确实是可以合并到研究二中一起完成，但是在我们进行研究的时候，可供借鉴的有关人际关系对社会责任影响研究文献非常少，为保证获得预期的研究结果和研究逐步递进的逻辑关系，就分开进行的。

为更加清楚地表达三个研究之间的逻辑，我们在文章的引言最后一段，和每个子研究后面的小讨论中，进行了相应的修改，突出三个研究的逻辑关系，请见文章蓝色修改部分。

意见3:研究者在三个研究中所使用的测量工具，尤其是人际关系的测量工具各不相同，社会责任感也使用了两个量表，请作者阐明这些量表所测量的内容之间的关系(内容效度)。

回应: (1) 对于人际关系的测量工具。因为研究一的目的是探索人际关系与社会责任是否存在相关，所以采用的是问卷调查，然后进行相关分析，但是研究二和研究三的目的是要获得二者之间的因果关系，所以采用的是文字材料的启动，分别操纵人际关系的效用与亲密密度，再测量社会责任感的变化。

研究一采用的问卷是“Canevello和Crocker (2010) 编制的、张敏，张林和Corcke (2012) 修订的一般人际交往目标量表。”

研究二是“根据Nelissen (2014) 所提出的影响关系效用的三个因素(个体目标的重要性、关系对个体达成目标的有用程度、个体的独立程度)，据此本研究编制了三种情境材料(高效用、低效用、控制情境)对人际关系效用进行了启动。”我们预试验结果表明三种情境材料对人际关系效用的启动是有效的，然后进行正式实验。

研究三是“根据已有研究(邱俊杰，闵昌运，周艳艳，张锋，2012)的实验范式，本研究设置了高、低两种关系亲密度的启动情境，即要求被试回忆不同的生活情境。”我们预试验结果表明该情境启动也是有效的。

综上，三个研究的测量工具或启动材料不同，主要是为实现不同的研究目的而选择的，而且对于研究二和三的启动进行了预试验分析，结果说明是有效的。

(2) 对于社会责任感的测量。

研究一采用John等(John, Donahue, & Kentle, 1991)编制大五人格问卷(Big Five Inventory, BFI)中的“尽责性”分量表测量社会责任感。该量表是目前国内外应用最普遍的量表，是测量责任感的常用工具(谭小宏，秦启文，2005)，在大五人格中是工作绩效最为有效的预测因子(钟建安，段锦云，2004)，并且具有良好的信度(黎红艳，徐建平，陈基越，范业鑫，2015; 李启明，陈志霞，2015)。

研究二和研究三采用的是我们自己根据Singg和Ader (2001)的学生责任感问卷自编的社会责任感问卷，该问卷采用情境设置，考察大学生社会责任感。这些情境与研究二和研究三进行的人际关系操纵是相对应的，测量的敏感度会更高些，同时还具有针对性，所在这两个研究中没有采用与研究一相同的问卷。

此外，我们认为，对于同一个问题的研究，采用不同的测量工具从不同角度进行测量，若是都能获得一致的结果，那么就更能够充分说明研究结果的可靠性和稳定性。

意见4:在4.3.2 “更为重要的是，人际关系的效用与亲密密度共同作用于社会责任感， $F(1,187) = 7.17, p = 0.008, \eta^2 = 0.37$ 。具体而言，在高亲密密度下，高效用组的社会责任感显著高于低效用组的， $F(1,187) = 20.38, p < 0.001, R^2 = 0.77$ 。同样，在低亲密密度下，高效用组的社会责任感也显著高于低效用组的， $F(1,187) = 31.33, p < 0.001, R^2 = 0.22$ 。这表明，人际关系亲密密度对效用与社会责任感的具有调节作用。”从数据论述和图中来看，这都

只是一个主效应，而不是效用和亲密度的交互作用，更不能说人际关系亲密度对效用与社会责任感关系具有调节作用，请核查数据。

回应：感谢专家的细致阅读与指正。这个地方的数据分析确实存在问题，我们重新检查了数据并进行了分析，同时也将本研究的所有数据都进行了一一检查和分析，确保统计结果无误。具体修改见文章研究三结果部分蓝色字体。

意见5：5.2 中，作者讨论了共情包括认知和情感共情成分，但后面又在论述人际关系中的效用和亲密度与这两个成分的关系，这种联系只是作者的过度推测，没有任何文献的依据和数据的支持，请作者仔细查阅关于认知共情和情感共情的定义。另，审稿人困惑的是，作者在第一个研究中使用了IRI量表，这个测量工具可以进行认知共情和情感共情的划分，但是作者没有做任何深入分析。

回应：（1）正如专家所言，在讨论部分对这个问题的解释确实是我们的推测，没有数据和文献支持。但是我们认为在讨论中进行大胆的推测是有必要的，其目的是为后面研究提供新的思路和提出问题。这也符合“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观点。当然，为了区分本研究的结果与推测之间的界限，在讨论部分明确指出该解释是我们的推测，有待进一步研究进行验证。感谢专家为我们指出这二者之间的区别，同时也提醒我们对结果推测应该在适度的范围之内进行。有关认知共情与情感共情的定义，我们阅读了最早提出这两个维度的文献（Gladstein, 1983）及相关文献，并在文章讨论部分进行修改。

Gladstein, G. A. (1983). Understanding empathy: Integrating counseling, developmental, and social psychology perspectives. *Journal of Counseling Psychology*, 30(4), 467-482.

肖凤秋, 郑志伟, 陈英和. (2014). 共情对亲社会行为的影响及神经基础. *心理发展与教育*, (2), 208-215.

（2）我们在第一个研究没有进行认知共情和情感共情分析，主要是由于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研究一的人际关系测量没有区分效用与情感两个维度，所以无法分别进行对应的认知共情与情感共情的关联分析，二是研究一的目的是确定人际关系与责任感的相关关系，以及共情对二者关系的解释。鉴于上述两个原因，我们没有进行深入分析。当然，专家的建议，为我们后面就此问题进行深入研究提供了很好的建议，我们会在设计上更加严谨和全面些，同时考虑到这些问题。

意见6：关于研究一的中介，建议用图来呈现结果。

回应：已经增加了图形。

审稿人2意见：社会责任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要件，也是人力资源管理研究中的当前热点，从人际关系角度出发有较强的本土化色彩，介入共情这一操作性较强的变量来理解社会责任感强化了人际关系对社会责任感理解，选题有一定的理论和实践意义。研究设计、方法相对较严谨，讨论和结果能自圆其说。

所研究对象、问卷调查和启动方法在反映真实社会情境中的人际关系和社会责任感方面会有一定的难度，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结论的可靠性，然而，这是在目前研究中难以避免的，也是可以理解的。

按照本文对人际关系的定义，人际关系能力强的人往往缺乏正直的秉性、社会责任感较差，这虽不是本研究的范围，也是构建和谐社会所应注意的，建议未来的研究中深入探讨，

可能不仅仅是从个体层面，需要建构包括情境因素在内的强有力的解释模型。

回应：感谢专家的鼓励和对进一步研究的建议，我们会在后续的研究中进一步完善和考虑这些问题。

第二轮

审稿人1意见：作者对审稿专家的建议进行了逐一修改和回复，修改质量较高。但在个别图表的呈现和结论的表述上需要进一步完善。

意见1：图3是亲密度对效用与社会责任感的调节作用，因此横坐标应该是高低亲密度，然后把高低效应放在一组看起来更明了。

回应：对图3横坐标与分类之间进行转换，见文章p10图3。

意见2：作者的结论看起来更像结果。类似于“中介”“显著高于，显著低于”“无明显差异”等这样的表述都是在陈述结果。结论应该是对结果的高度概括和总结。

回应：我们对本文的“6.结论”进行凝练与提升，并进行了总结与概括，见p12的修改。

第三轮

审稿人1意见：文章经过仔细修改，可以发表。The English abstract is edited for your reference.

回应：感谢编委专家对本文的审读，尤其让我们感动的是对本文英文摘要进行的全面指正与润色，谢谢。我们根据专家的意见，对英文摘要进行再次修改，并邀请英文水平较高的专家进行了全面检查和把关。

第四轮

审稿人1意见：作者根据审稿专家的建议做了相应地调整和修改，但仍存在一些需要修正的问题。

意见1：文章摘要部分的最后“因此，人际关系通过提高共情而正向影响社会责任感”，这句推论由于缺乏解释，提出得略显突兀，在上文中难以找到坚实的依据，建议作者进一步斟酌修改。

回应：根据专家的建议，我们将此句话改为“因此，人际关系对社会责任感具有明显正向影响。”

意见2：文章的题目是“人际关系对社会责任感的影响：共情的中介作用”，但整个研究过程中只有研究1考察了共情在人际关系和社会责任感之间的中介效应，研究2和3则只谈到了人际关系的亲密性和效用对社会责任感的影响，在研究2和3中没有继续考察共情的作用。建议作者基于目前的研究结果，对题目进行修正。

回应：根据专家的意见，我们将题目改为“人际关系对社会责任感的影响”。

意见 3: 研究 1 的讨论部分只探讨了人际关系对社会责任感的相关关系，建议作者在这一部分补充说明共情为何会在人际关系和社会责任感之间起到中介作用。

回应: 在研究 1 的讨论中，我们补充了共情作用的解释（见 p5-6），“研究一采用问卷调查发现，……，从而加强了对他人承担责任的意识与行为。”另外，我们在文章的最后一部分综合讨论中，还有就共情的中介作用专门进行了系统地讨论，见文章讨论(p11-12)“5.2 共情在人际关系对社会责任感的影响中发挥着部分中介效应”。为避免重复，所以在研究 1 的小讨论中，根据已有研究结果简单地解释了共情的作用，在后面综合讨论则深入展开讨论。